儒家修身文化对农户信贷违约的影响研究*

王洪江，何　婧

（中国农业大学，北京　100083）

摘　要：在“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政策背景下，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农户信贷违约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同于既有研究主要从儒家价值观念切入，文章聚焦于儒家修身文化这一行动指南，基于五期中国农业大学农村普惠金融调查的混合横截面数据与古代地方志资料，运用三阶段联立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儒家修身文化对农户信贷违约的影响。研究发现，儒家修身文化能够显著抑制农户信贷违约。机制分析表明，儒家修身文化主要通过提高农户还款能力发挥作用，而非依赖还款意愿的增强。基于上述结论，建议从唤醒农民文化自觉、开展“修身赋能”融合培训、推动信贷产品与修身文化元素有机结合等方面系统构建实践路径，从而以儒家修身文化滋养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建设。

关键词：儒家修身文化；农户；信贷违约；还款能力

中图分类号：B222；F83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89(2026)01-0083-13

一、引　言

文化是影响经济和金融的深层因素之一[1]。我国高度重视金融发展中的文化建设，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作为金融的重要特质，风险性与文化的关联尤为紧密。以西方“狼性文化”为例，其倡导的极端竞争、逐利至上理念，多次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2]。在我国以信贷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中，农户信贷违约直接关系金融风险的可控性[3]。现阶段，中国农户受市场经济的影响相对有限，其信贷行为仍带有深刻的传统文化烙印。那么，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4]，儒家文化是否影响农户信贷违约？如何影响农户信贷违约？厘清上述问题，对于“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筑牢金融风险文化防线、保障金融行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既有研究证实，儒家文化对企业信贷违约具有抑制作用[5-7]。但现有研究存在两大不足。内涵识别上，对儒家文化的剖析存在片面性。儒家文化体系内涵丰富，精准识别其中影响信贷违约的思想内涵，是此类研究的逻辑起点。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指出，文化如同“人格的放大”，通过选择并强化特定的价值观念与行动指南形成自身构型。因此，本文将儒家文化分为价值观念与行动指南两大部分：前者为价值评判的准则，回应“应相信什么”的问题；后者提供具体的行为规范，解决“应如何做”的问题。既有研究主要考查了儒家价值观念对企业信贷违约的影响，普遍认为该类观念主要通过提升还款意愿抑制违约，而还款能力增强所发挥的作用则处于次要地位。例如，“信”

*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12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173081)。

作者简介：王洪江，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政策。

通信作者：何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村金融、普惠金融。

“道德内省”等观念能够提高企业高管的还款意愿[5-7]；“仁”“和”等观念则能够增强企业还款能力[5-6]。价值观念需经个体内化方能影响决策，要求企业高管等行为主体具备一定的理解与迁移应用能力。相比之下，农户往往受限于教育水平与认知能力，难以系统学习儒家价值观念。儒家行动指南则提供了可直接模仿与实践路径，使农户无需深谙理论即可践行儒学理念。遗憾的是，尚无研究从行动指南视角考查儒家文化对信贷违约的影响，亦缺乏对农户群体的关注。

度量方法上，既有研究对儒家文化的测度尚不够精准。既有研究普遍基于历史信息度量儒家文化。例如，使用企业注册地与古代七个儒学中心的距离[5]、孔庙密度[6-8]、进士密度[9]等指标度量儒家文化。上述指标虽能反映地区整体的儒家文化氛围，却难以精准对应具体的儒家文化思想。这类指标隐含着一个强假设，即特定区域内各类儒家思想的影响强度趋同。儒家文化内涵丰富且结构复杂，受地域历史、社会与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其内部不同思想维度在不同地区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中国南方地区的宗族文化氛围相较北方地区更为浓厚。因此，为准确辨析儒家文化不同维度产生的经济影响，有必要构建更精准、更具区分度的度量方式。

针对上述不足，本文从行动指南的维度创新界定儒家修身文化，并实证检验其对农户信贷违约的影响。文化与金融研究多将“修身”界定为“道德上的自我反省”或“君子慎独”[7]，虽具实践意涵，但更侧重于理论认知与内化，缺乏对具体可操作行为的规定，因此本质上属于价值观念范畴，而非行动指南。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则普遍认为，“修身”是一套具体的行动指南和实践方法[10-12]。朱熹有云：“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是修身内事。”(《朱子语类》)当代研究进而将此“四目”阐释为“修身”的核心内涵[9]。其中，“正心”意指持守端正的心念和正确的态度；“诚意”则要求个体客观地审视自我，做到“毋自欺”；“致知”则强调通过实践获取知识，并将其付诸实践；“格物”指通过实践探究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据此，本文从行动指南维度将儒家修身文化概括为“实践反思”与“知行合一”两个层面：前者强调以端正的态度审视并总结自身实践以改进不足；后者主张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并将知识复归于实践，以实现自我完善。农户信贷行为深度嵌入其生产经营与财务管理实践之中，上述理论界定为分析其信贷违约提供了直接依据：“实践反思”对应农户总结经验、优化决策的能力；“知行合一”则对应其学习并应用农业技术、财务知识以提升还款能力的行动过程。

为精准测度儒家修身文化的影响，本文从理论内涵与传播特性角度出发，基于中国古代地方志中记载的儒家学者数据，创新性构建儒家修身文化度量指标。同时，基于中国农业大学农村普惠金融调查所形成的混合横截面数据，考查儒家修身文化对农户信贷违约的影响，并深入剖析其内在作用机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拓展儒家文化与信贷违约的相关研究。既有文献主要关注儒家价值观念对企业信贷违约的影响[5-7]，本文则首次聚焦于儒家修身文化这一行动指南对农户信贷违约的作用，并发现其影响机制主要在于提升农户还款能力，与儒家价值观念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区别。第二，从文化视角丰富农户信贷违约的影响因素研究。既有研究主要从农户特征、信贷条件与宏观环境等方面研究农户信贷违约的影响因素，涵盖经济状况[13-14]、社会网络[15]、教育水平[16]、金融知识[3]、道德情感[17]、贷款利率[18]、自然灾害[19]以及乡村治理[20]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第三，基于古代地方志资料，构建更加精准的儒家修身文化指标，提高研究解释力与严谨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儒家修身文化影响农户信贷违约的理论分析

儒家修身文化通过建立一套以“实践反思”与“知行合一”为内核的行动指南，对农户信贷违约产生直接约束作用。在这一文化影响下，个体被引导基于具体的生产生活实践，通过持续的自我检视与行为反思，总结过往经验、识别自身不足，并借助“知行合一”的机制实现自我提升，从而形成稳定且符

合社会期望的行为模式。在农户信贷决策这一具体实践场域中，儒家修身文化将“按时还本付息”从外在的经济契约义务，内化为一项具体的修身实践与衡量个人修身成效的关键标尺，从而能够有效抑制农户信贷违约。

在儒家修身文化的影响下，农户会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检视并修正自身对信贷活动的理解，逐步形成系统、理性的认知：第一，信贷是支持生产生活的重要金融工具，违约会损害个人信用，并制约未来的信贷可得性；第二，与政府补贴救济或亲友间无固定条件的互助性借贷不同，正规信贷具有明确的还款期限与利率，因而必须审慎评估自身还款能力，做到量力而借、理性负债；第三，按时还本付息的根本在于可支配资金积累，因此需要提升收入水平、优化家庭财务规划，为还款提供切实保障。在此基础上，农户会将上述认识应用于信贷实践：一方面树立主动履约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增收与财务规划提高自身还款能力。在此过程中，按时还本付息逐渐超越单纯的经济履约，被内化为对个人“实践反思”“知行合一”修身成效的关键验证。相反，信贷违约由于明显违背农户在实践中形成的正确信贷认知，在行为决策过程中会被自然排除。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儒家修身文化对农户信贷违约具有抑制作用，即农户受儒家修身文化的影响越大，其发生信贷违约的概率越低。

（二）儒家修身文化影响农户信贷违约的作用机制分析

还款意愿表现为借款人履行还款义务的主观意愿，还款能力则反映其客观财务履约实力，二者构成影响农户信贷违约的两大核心因素，且均与信贷违约呈负向关系[19]。已有研究表明，农户信贷违约主要表现为还款能力不足引发的被动违约[13]。根据IPC小微信贷技术①框架，第一还款来源（如持续收入水平）与第二还款来源（如可变现资产规模）是农户还款能力的基础。

儒家修身文化能够从农业生产与财务管理两个实践维度提高农户的还款能力，从而抑制其信贷违约。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儒家修身文化中的“实践反思”引导农户客观审视自身不足并总结成功经验，从而改进生产方法、提高生产效率；“知行合一”则推动农户针对具体问题学习先进农业技术并付诸实践，从而提高生产效率[21-22]。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会直接增加农户收入、改善现金流状况，从而抑制因资金不足而产生的信贷违约。在财务管理实践中，“实践反思”促使农户结合实践认识到金融知识与理财能力的重要性，并正视自身在该领域的不足；“知行合一”则激励其结合家庭开支规划、生产成本测算等实际需求，主动学习相关知识并应用于日常管理。已有研究表明，丰富的金融知识和较强的财务管理能力，有助于提高家庭的财富积累水平和抗风险能力，从而有效提升农户还款能力，降低信贷违约风险[3]。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儒家修身文化通过提高农户还款能力抑制其信贷违约。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1.微观农户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大学2017年、2018年、2019年、2023年及2024年开展的农村普惠金融调查。该调查并非对固定样本的追踪调查，而是采用“年度重新抽样”的横截面调查模式。因此，本文最终使用的数据结构为混合横截面数据（Pooled Cross-Sectional Data）。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至2022年期间未组织开展相关调查，因此本文数据未包含此间样本。

上述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

① IPC小微信贷技术（简称“IPC微贷技术”），是由德国IPC公司提供的一体化信贷咨询服务和解决方案，其核心是评估个人或小型企业偿还贷款的能力，主要包括考查借款人偿还贷款的能力、衡量借款人偿还贷款的意愿等。

其次，各区域内依据经济发展水平高、中、低的差异分别选取不同省份；接着，在选定省份内，按同样的经济差异标准选取县或县级市；然后，在每个选定县内继续按经济水平差异选取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2~3个自然村；最后，以入户普查方式对农户进行调查。上述五期调研共覆盖全国8个省级行政单位、22个地市级行政单位，共调查农户9 556户，删除变量缺失样本后获得有效样本8 815个，样本有效率为92.25%。

2.儒家文化数据

本文将地方志中记载的、明清时期因著书立说或参与民间儒学教育、研究活动而被收录的人物，界定为“儒家学者”。儒家学者数据通过手工整理获得，具体来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7部地方志②。该套地方志由清朝中央政府统一编纂，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与系统性，能够最大程度确保所载内容准确。该套地方志以省份为单位编纂，最小地理单元可追溯至古代“县”一级，并分朝代辑录了成书之前的地方史料。该套地方志约成书于1781年，本文涵盖的儒家学者数据时间跨度为1368年至1781年，共414年，包括整个明代时期及清代早期。

明清时期的历史人物信息仍能映射当今农村社会与农户行为中所内嵌的儒家传统文化影响。首先，文化具有显著的代际延续性[1]。已有研究指出，工业化与现代化并未瓦解乡土中国的文化基因，也未使传统社会结构完全坍塌[23]；儒家文化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内化为民众普遍认同的心理结构与行为准则，因而运用历史数据对其进行度量具备理论上的合理性[8]。其次，明清两代作为中国帝制时代的晚期，其文化形态对当代社会的影响直接且深远，因此学界普遍采用该时期的历史变量作为儒家文化的代理指标[9]，本文亦延续这一研究传统。最后，中国古代民间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被当地民众尊敬的人往往被称为“乡贤”[23-24]，本文所定义的“儒家学者”亦可视为“乡贤”的组成部分。已有研究表明，古代“乡贤”仍对当代农村社会具有重要影响[23]。

3.其他数据

（1）宗教文化数据来自国家宗教事务局。（2）金融发展程度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政府工作报告、公告等官方公开资料。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三阶段联立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在各阶段所涉及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信贷需求、信贷可得性和信贷违约三个变量。调研问卷中设置了问题：“目前您家是否有从银行或农信社获得贷款”选项包含三项，分别为“有贷款”“没有申请过”以及“申请过但被拒绝”。变量赋值规则如下：对于信贷需求，若农户选择“有贷款”或“申请过但被拒绝”，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对于信贷可得性，若农户回答“有贷款”，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此外，问卷中还设有问题：“您家是否曾发生贷款到期未还的情况”若农户回答“有”，其信贷违约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核心解释变量

儒家修身文化。本文使用农户所在地市级行政单位的明清时期儒家学者密度，即明清时期儒家学者数量（个）除以当地行政区划面积（万平方公里），度量农户受到儒家修身文化影响的程度。本文所使用的7部地方志收录了明清时期151位儒家学者的姓名、籍贯与事迹。表1列举了其中4位代表性明清时期儒家学者及其主要事迹。结合表1内容，可将基于儒家学者构建儒家修身文化度量指标的主要依据归纳为以下两点：第一，儒家学者或有儒学著作流传于世，或通过躬身实践为民间儒学教育与研究事业的发展作过突出贡献。他们身体力行地践行儒家修身文化，生平事迹是该文化传统的直接体现。

② 具体包括《山东通志》《四川通志》《江西通志》《河南通志》《广西通志》《贵州通志》及《钦定盛京通志》。

第二，儒家学者广泛分布于农村社会，且深受社会大众尊敬。农民出于对知识与文化的向往，会自发效仿其言行，这一过程构成儒家修身文化在基层社会传播的重要渠道。

表1 明清时期儒家学者事迹举例

地方志	姓名	籍贯	事迹
《四川通志》	韩孜	南充人	勤修力学，登乡荐后，筑室青茅山，沈酣典籍，寒暑不辍
《江西通志》	俞塞	歙县人	少读书讲道，不应举，乡邦以学行宗之。崇祯末弃家出游，抵石城，住东门城楼，城卒憎其哦诗声，却之，乃僦居山寺。董令应誉闻而宾礼之
《山东通志》	王敕	历城人	成化甲辰进士，博极群书，乡党敬慕，所著有《五经通旨》《漫游稿》
《贵州通志》	张继宗	安庄人	由明经任教职，倡正学，严课程。归家教训子弟，成就甚多，乡人颂之

注：为便于阅读，本表将原文转换为简体字，并添加现代标点。

本文构建儒家修身文化指标的步骤如下：首先，以地方志记载为基础，按古代县级行政区划统计各地的儒家学者数量。其次，依托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将儒家学者所在古代县与当代地市级行政单位匹配。鉴于当代地市级行政单位的地理范围相对较大，常涵盖多个古代县，故将这些古代县的明清时期儒家学者统一归入对应的当代地市级行政单位。最后，以明清时期儒家学者密度，即地市级行政单位的明清时期儒家学者数量(个)与其城市地理面积(万平方公里)的比值，作为儒家修身文化的代理变量。

本文进一步验证了所构建的儒家修身文化指标的有效性与独特性。本文样本涵盖8个省级行政单位的22个地市级行政单位，对应151位明清时期儒家学者。表2展示了这22个城市明清时期儒家学者的密度与数量。同时，已有研究使用城市明清进士密度，度量微观个体受整体儒家文化氛围的影响[9]。为便于比较分析，表2同时列示了各城市明清进士密度与数量。由表2可知，第一，明清时期儒家学者密度较高的城市，多集中于宋明理学、阳明心学的核心传播区域③。已有研究表明，这两大儒家流派均将“修身”置于重要地位[25]，表明儒家学者密度能够有效捕捉儒家修身文化。同时，由于理学、心学的发展与传播主要以南方地区为核心阵地，因此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山东省，虽潍坊、济南等城市在明清时期儒家学者密度排名中较为靠前，但其整体的儒家学者密度未形成明显优势。第二，度量儒家修身文化的学者密度与度量整体儒家文化氛围的进士密度仅呈弱相关(Pearson系数=0.3295，不显著)。一方面，反映修身文化作为儒家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到整体儒家文化氛围的影响；另一方面，二者之间较低且不显著的相关性说明，儒家学者密度能够有效捕捉儒家文化中有别于其他思想内涵的独特维度——儒家修身文化。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儒家学者地理密度可作为儒家修身文化的理想代理指标。

3. 控制变量

包括受访者的性别(男性=1；女性=0)、年龄(岁)、受教育年限(年)、婚姻状况(已婚=1；未婚=0)、家庭成员数量(人)、家庭劳动力占比(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成员人数)、家庭总收入(万元，取对数，并在1%水平上作缩尾处理)、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城市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GDP)。

③ 宋明理学、阳明心学的核心传播区域包括如下地区。南充市：宋代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曾在此讲学；明代大儒任瀚于此聚徒授学，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川北学术群体。贵阳市：明代心学开山鼻祖王阳明在此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标志着阳明心学初步形成。宜宾市：宋代程公许、程公说、程公硕三兄弟就读于宜宾蟠龙书院并同登进士，使该书院成为川南理学核心阵地；明代宜宾承接贵州龙场心学辐射，成为阳明心学向四川南部传播的重要节点。赣州市：北宋周敦颐与程颢、程颐在此讲学，奠定理学根基；明正德年间，王阳明弟子薛侃在赣州首刻《传习录》，标志着阳明心学发展成熟。

表2　明清时期城市儒家学者、进士数据

省份	城市	明清儒家学者密度	明清儒家学者数量	明清进士密度	明清进士数量
四川省	南充市	23.24	29	156.26	195
贵州省	贵阳市	13.68	11	300.88	242
山东省	潍坊市	8.67	14	390.26	630
四川省	宜宾市	6.78	9	100.97	134
江西省	赣州市	5.84	23	48.01	189
山东省	济南市	4.88	5	384.62	394
山东省	德州市	3.86	4	320.53	332
山东省	烟台市	3.61	5	357.74	496
重庆市	重庆市	3.40	28	68.81	567
四川省	乐山市	3.14	4	69.95	89
贵州省	黔南州	2.29	6	29.01	76
辽宁省	辽阳市	2.09	1	62.66	30
河南省	洛阳市	1.97	3	239.56	365
河南省	商丘市	1.87	2	366.22	392
河南省	南阳市	1.51	4	44.89	119
辽宁省	铁岭市	0.77	1	14.63	19
贵州省	毕节市	0.37	1	25.33	68
贵州省	遵义市	0.33	1	22.76	70
河南省	安阳市	0	0	214.91	158
广西壮族自治区	崇左市	0	0	7.50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	百色市	0	0	1.93	7
辽宁省	阜新市	0	0	0.00	0
儒家学者密度与明清进士密度的Pearson相关系数			0.3295		

4. 识别变量

为确保三阶段联立Probit模型可被有效估计，需添加识别变量，以满足任意两个阶段的自变量不完全相同这一条件。对于信贷需求阶段的方程，本文以“是否有其他借款”（农户拥有除银行信贷以外的其他借款则取1，否则取0）作为识别变量。从理论逻辑来看，农户拥有其他借款与其信贷需求的关联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民间借贷、亲友拆借等其他借款可能对信贷需求产生替代效应，即其他资金支持会降低农户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另一方面，农户持有其他借款往往意味着其存在较高的资金需求，仅靠其他借款无法完全覆盖资金缺口，这类农户反而更有可能进一步产生信贷需求。同时，农户的其他借款多为亲友间借贷，其信息往往难以被银行捕捉，因此农户是否拥有其他借款并不会影响其信贷可得性。此外，为控制该变量对违约行为的潜在影响，本文也将其纳入信贷违约阶段方程。

在信贷可得性阶段方程中，本文引入“是否有城市商品房”（农户拥有城市商品房时取值为1，否则为0）与“金融知识得分”④两个变量。从作用机制来看，城市商品房作为优质抵押品，可显著降低金融机构与农户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抵押品的有效覆盖率，进而直接增强农户的信贷获取能力；同

④ 调查问卷中设置了四道考查农户金融知识的选择题：其一，假设在银行存100元，年利率2%，存期5年，问5年后账户里的金额，选项为“1. 等于110；2. 大于110；3. 小于110；4. 不知道”；其二，若银行利率10%，通货膨胀率12%，一年后取钱能买到的东西情况，选项是“1. 更多东西；2. 一样多的东西；3. 更少东西；4. 不知道”；其三，当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6时，600元人民币对应的美元数量，选项为“1. 100；2. 3 600；3. 60；4. 不知道”；其四，固定收益的金融产品是什么，选项有“1. 股票；2. 债券；3. 基金；4. 不知道”。本文参照秦芳等[26]的做法，将回答正确的问题赋值为1，其他情况赋值为0，并对正确回答的题目数量进行简单相加求和。

时，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的农户，往往更能准确理解贷款申请流程、完整准备申请材料，并与金融机构进行高效沟通，这些优势均有助于提升其信贷获批概率。农户的信贷需求主要源于生产经营或日常生活的资金缺口，与其是否拥有城市商品房、金融知识水平无直接关联。同时，在信贷违约阶段，尽管城市商品房具备合格抵押品属性，但受农户贷款普遍金额较小、处置房产等抵押物可能面临社会舆论压力等现实因素制约，银行极少通过处置农户的城市商品房实现债权回收。因此，城市商品房拥有情况对农户信贷违约行为的影响有限。此外，为控制潜在干扰，本文也将金融知识得分纳入信贷违约阶段方程。

在信贷违约阶段方程中，本文以“是否有信用评级”（农户拥有信用评级取1，否则取0）作为识别变量。拥有信用评级的农户通常更重视自身的信用记录，清楚违约会导致评级下降、影响未来信贷的可获得性与利率，因而主动规避违约。同时，金融机构审批贷款的核心依据是“评级等级”而非“是否有信用评级”，因此“是否有信用评级”与信贷可得性无直接关联。此外，农户的信贷需求源于资金缺口，与是否拥有信用评级无关。

表3为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被解释变量看，在全部样本农户中，有信贷需求的农户占比为17.52%；在有信贷需求的样本中，92.29%的农户成功获得了信贷，表明样本农户的信贷需求满足率较高；在获得信贷的农户中，违约比例为10.25%，与已有研究[16]样本的11.64%接近，说明本文样本的违约比例相对合理。从核心解释变量看，儒家修身文化的均值为3.66、标准差为3.90，表明不同样本农户的儒家修身文化水平差异明显，为后续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变异基础。从受访者个体特征看，样本中男性占比57.08%，平均年龄为53.6周岁，平均受教育年限约7.66年，金融知识水平普遍偏低，绝大多数处于已婚状态。从家庭特征看，样本农户的平均家庭规模为4.25人，家庭劳动力占比接近60%，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足；家庭年均总收入约5万元。此外，全部样本中拥有其他借款、城市商品房及银行信用评级的农户占比分别为14.36%、12.82%和20.90%；农户所在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均值约为2.55。

表3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项目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信贷需求	8 815	0.1752	0.3801	0	1
	信贷可得性	1 544	0.9229	0.2668	0	1
	信贷违约	1 425	0.1025	0.3034	0	1
核心解释变量	儒家修身文化	8 815	3.6585	3.9022	0	23.239
	性别	8 815	0.5708	0.4950	0	1
	年龄	8 815	53.6006	12.1246	4	90
	受教育年限	8 815	7.6577	3.4481	0	22
	婚姻状况	8 815	0.9176	0.2749	0	1
控制变量	家庭成员数量	8 815	4.2549	1.8092	1	15
	家庭劳动力占比	8 815	0.5936	0.2987	0	1.6667
	家庭总收入	8 815	1.7918	0.8536	0.1133	4.1897
	城市金融发展水平	8 815	2.5518	0.8139	1.3846	6.2578
	是否有其他借款	8 815	0.1436	0.3507	0	1
	是否有城市商品房	8 815	0.1282	0.3343	0	1
识别变量	金融知识得分	8 815	0.5401	0.9115	0	4
	是否有信用评级	8 815	0.2090	0.4066	0	1

（三）模型构建

研究农户信贷违约问题时，面临着由样本选择性问题引发的内生性偏误。如图1所示，农户信贷违约需经历“信贷需求—获得信贷—信贷违约”三个阶段，且每个阶段均存在选择性问题。从样本选择逻辑看：首先，有信贷需求的农户是全体农户中的选择性群体；其次，获得贷款的农户是有信贷需求群体的二次选择结果；最后，发生违约的农户是获贷群体的三次选择结果。在此类多层选择机制下，即便数据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仍可能因样本选择性偏差引发内生性偏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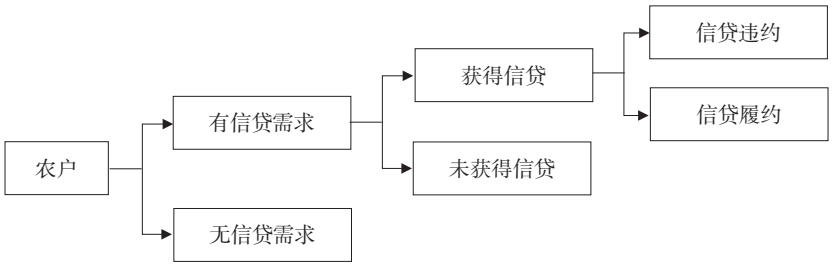

图1　农户信贷行为示意图

部分研究虽已关注到个体信贷违约过程中的样本选择问题，但仍存在不足。例如，Bassen采用Heckman模型，将农户信贷可得性与信贷违约纳入同一分析框架[27]，虽解决了农户“信贷可得性”层面的样本选择性问题，却忽略了“信贷需求”层面的样本选择性问题，进而无法彻底消除信贷需求与信贷可得性引致的双重样本选择估计偏误。因此，本文参考李庆海等[15]的做法，使用三阶段联立Probit模型考查儒家修身文化对农户信贷违约的影响，以解决上述估计偏误。模型具体设置如下：

农户信贷需求阶段（第一阶段）方程：

$$\begin{cases} Y_1^* = X_1'\beta_1 + \varepsilon_1 \\ Y_1 = I(Y_1^* > 0) \end{cases} \tag{3}$$

若 $Y_1 = 1$，农户信贷获得阶段（第二阶段）方程：

$$\begin{cases} Y_2^* = X_2'\beta_2 + \varepsilon_2 \\ Y_2 = I(Y_2^* > 0) \end{cases} \tag{4}$$

若 $Y_1 = 1$ 且 $Y_2 = 1$，农户信贷违约阶段（第三阶段）方程：

$$\begin{cases} Y_3^* = X_3'\beta_3 + \varepsilon_3 \\ Y_3 = I(Y_3^* > 0) \end{cases} \tag{5}$$

为确保模型可识别，联立方程模型（1）~（3）的协变量需满足 $X_1 \neq X_2 \neq X_3$，即 X_1、X_2、X_3 两两不完全相同；Y_1^*、Y_2^*、Y_3^* 表示潜在结果，Y_1、Y_2、Y_3 表示实际观测到的二值指标（分别对应农户是否有信贷需求、是否获得信贷、是否发生信贷违约）；$I(\cdot)$为二值示性函数（“是”取1，“否”取0）。同时，假设联立方程误差项 $(\varepsilon_1, \varepsilon_2, \varepsilon_3) \in N_3(0, V)$，其中，$V$ 为对称矩阵；对于 ε_k，$\varepsilon_l(\varepsilon_1, \varepsilon_2, \varepsilon_3)$ 且 $k \neq l$，误差项相关系数满足 $\rho_{lk} = \rho_{kl}$，$\rho_{kk} = 1$，且各方程误差项分别与 X_1、X_2、X_3 相互正交。

通过三阶段联立Probit模型，可将农户划分为四类互斥群体：第一，无信贷需求（Y_1=0）；第二，有信贷需求但未获得信贷（Y_1=1，Y_2=0）；第三，有信贷需求且获贷后履约（Y_1=1，Y_2=1，Y_3=0）；第四，有信贷需求且获得信贷后违约（Y_1=1，Y_2=1，Y_3=1）。这四类事件的概率之和为1，满足完备互斥条件。模型参数估计采用极大似然法[15]。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4为儒家修身文化影响农户信贷违约的三阶段联立Probit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ρ_{12}、ρ_{23}、ρ_{13}表示联立方程间的相关系数。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可拒绝上述3个方程的误差项相关系数为0的原假设。这一结果说明，3个方程是相互影响、并非完全独立。同时ρ_{12}、ρ_{23}的值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估计农户信贷违约方程时，存在双重样本选择问题，由此表明本文采用三阶段联立Probit模型合理。

由表4可知，儒家修身文化对农户信贷违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农户受儒家修身文化的影响越大，其发生信贷违约的可能性越低，假说1得证。同时，儒家修身文化对农户信贷需求具有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传统儒家修身思想的影响下，农户更可能具有审慎克制的消费与借贷心态。此外，儒家修身文化对信贷可得性无影响，说明当前银行在进行信贷发放决策时，尚未考虑到文化因素的影响。

表4 基准回归

变量	信贷需求		信贷可得性		信贷违约	
	系数值	标准误	系数值	标准误	系数值	标准误
儒家修身文化	−0.0234*	0.0133	0.0048	0.0240	−0.0763***	0.0274
性别	0.2370***	0.0528	0.0906	0.1312	0.3962***	0.0841
年龄	−0.0216***	0.0022	−0.0194***	0.0050	−0.0117**	0.0049
受教育年限	−0.0022	0.0085	0.0083	0.0116	0.2458*	0.1493
婚姻状况	0.2530***	0.0548	0.3914**	0.1534	−0.0370***	0.0105
家庭成员数量	0.0215	0.0151	−0.0016	0.0315	0.0199	0.0249
家庭劳动力占比	0.1689***	0.0595	0.1759	0.1883	−0.1735	0.2900
家庭总收入	0.2193***	0.0356	0.3060***	0.0613	0.0708	0.0615
城市金融发展水平	0.1844**	0.0916	0.0880	0.1648	0.1672	0.1354
是否有其他借款	0.4115***	0.0393			0.2390*	0.1435
是否有城市商品房			0.4610**	0.2015		
金融知识得分			0.1199***	0.0462	−0.0902**	0.0447
是否有信用评级					−0.1108	0.0938
常数项	−0.9921***	0.2371	−0.3705	0.7320	−1.7752***	0.380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ρ_{12}	0.6783**	0.2061				
ρ_{23}			0.6420*	0.2425		
ρ_{13}					0.8472	0.2661
联合显著性检验	$\rho_{12}=\rho_{23}=\rho_{13}=0$，$P=0.0001$					
样本量	8 815					

注：所有回归均采用地市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5]

首先，为控制地区层面潜在因素的干扰，本文依据“汉地十八省”[6]这一儒家文化传承深厚、社会

⑤ 囿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⑥ 对应当代的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清代为甘肃布政使司，含今甘肃、宁夏及青海东部）18个省级行政区。

经济结构趋同的传统核心区域界定，对样本范围进行调整。“汉地十八省”作为历史上汉族长期聚居的内地核心区域，其内部儒家文化传承连续且影响深入，长期塑造着民众的行为模式；同时，该区域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相近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与信用环境。因此，聚焦于此区域进行分析，能够更有效地剥离地区异质性对估计结果的干扰，从而更清晰地识别儒家修身文化对农户信贷违约的净影响。具体操作中，本文剔除不属于该范围的辽宁省样本(共625个观测值)后重新估计，结果仍显示儒家修身文化对农户信贷违约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基准结论一致。

其次，为排除其他文化影响，本文进一步控制宗教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影响。一方面，自唐宋以来儒、释、道三家在思想与实践层面深度融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佛道文化可能与儒家修身文化交织并存，干扰对后者的独立识别；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西方等外来文化伴随全球化进程传入中国，对传统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形成冲击，亦可能影响农户的经济与信用决策。为此，本文借鉴既有研究，分别采用地级市层面的佛寺密度与道观密度(个/万平方公里)测度宗教文化[9]，以地区对外开放程度⑦代理外来文化的影响[28]，并将上述变量同时纳入基准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这些文化因素后，儒家修身文化对农户信贷违约的抑制作用依然稳健，进一步支持了本文核心结论的可靠性。

五、影响机制分析

如前文所述，儒家修身文化主要通过提高农户的还款能力，抑制其信贷违约。学界通常依据违约成因，将信贷违约划分为主动违约与被动违约两类：前者指因还款意愿缺失导致的违约，后者则定义为因还款能力不足引发的违约[13]。为进一步考查儒家修身文化抑制农户信贷违约的影响机制，本文参考这一分类逻辑，将农户信贷违约进一步细分为主动违约与被动违约⑧。本机制检验沿用基准回归的联立方程模型(1)~(3)，区别在于将被解释变量中的“信贷违约”分别替换为“主动违约”与“被动违约”两个细分指标。若儒家修身文化对主动违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则表明其通过提升还款意愿抑制违约；若对被动违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则印证其通过增强还款能力降低违约风险。

在信贷违约的具体分类操作中，本文依据调研问卷对违约原因的详细问询进行判定。调研问卷在问题“您家是否曾发生贷款到期未还的情况”之后，设置了追问问题“如果有，贷款到期未还的原因是?”本文依据对该问题的回答，对农户信贷违约进行分类：若农户选择“经营项目失败”“家庭有意外支出”“没有还款能力”等客观因素导致的违约，则归为被动违约；将选择“别人都不还”“不知道要还”“没有催要”等主观因素引发的违约，界定为主动违约。在1 425户获得信贷的样本农户中，主动违约农户为35户，被动违约农户为111户，主动违约样本量显著偏少。考虑到小样本下若保留过多解释变量，易引发模型过度参数化及估计收敛问题，本文在信贷违约阶段方程中剔除“是否有其他借款”这一变量。这一调整可有效简化模型设定，保障参数估计的稳定性，且修改后的模型仍满足三阶段联立Probit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

表5为机制分析的回归结果。Panel A的结果显示，儒家修身文化对农户主动违约行为的抑制效应并不显著；Panel B的结果显示，儒家修身文化显著抑制农户的被动违约行为，且系数绝对值由基准回归的0.0763提升到0.1165。上述结果表明，与已有研究普遍认为的“儒家价值观念主要通过提高还款

⑦ 若农户所在城市属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首批设立的20个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所在的省级行政区域，则将外来文化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这20个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具体包括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营口。

⑧ 在曾获得过贷款的农户中，若农户发生过主动违约，则主动违约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若农户曾有过被动违约，则被动违约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意愿抑制企业信贷违约，而提高还款能力仅处于补充地位”的观点不同，儒家修身文化对农户信贷违约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提升还款能力实现，直接验证假说2。这一结论也从侧面印证儒家修身文化的独特属性，即相较于儒家“信”“仁”“和”以及“忧患”等作用于主观意识的价值观念，儒家修身文化更具鲜明的实践导向性，是指导个体行为的行动指南。

表5 影响机制分析

变量	Panel A						Panel B					
	信贷需求		信贷可得性		主动违约		信贷需求		信贷可得性		被动违约	
	系数值	标准误	系数值	标准误	系数值	标准误	系数值	标准误	系数值	标准误	系数值	标准误
儒家修身文化	−0.0234*	0.0133	0.0036	0.0240	−0.0072	0.0306	−0.0233*	0.0133	0.0072	0.0237	−0.1165***	0.043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识别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 815						8 815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五期中国农业大学农村普惠金融调查的混合横截面数据，结合创新构建的儒家修身文化度量指标，考查作为儒家行动指南的修身文化对农户信贷违约的影响。研究发现，儒家修身文化能够显著抑制农户的信贷违约。机制分析表明，与既有研究“儒家价值观念主要通过提高还款意愿抑制企业信贷违约，提高还款能力处于次要地位”的结论不同，本文发现儒家修身文化抑制农户信贷违约的核心路径是提升其还款能力，而非还款意愿。

（二）政策建议

第一，以儒家修身文化厚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根基，唤醒农民群体的文化自觉与价值认同。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应系统梳理本地乡贤事迹、家风家训等文化资源，提炼其中与当代金融伦理相契合的修身元素，通过“信用示范户”“道德模范”等评选，树立可见、可学的身边典型。同时，借助乡村讲堂、短视频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浸润式宣传，将儒家修身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引导农民在日常生活与金融活动中自觉践行，筑牢“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乡土根基。

第二，以“修身赋能”培训促进农户知行合一，夯实“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实践能力支撑。集中培训是优化农户生产方式[29-30]与财务管理模式的有效途径。应将儒家修身文化深度融入农业技术与金融知识培训中，构建“文化引领—能力提升”的融合机制。其一，在开展农业生产技术或金融知识培训前，可向农户宣传儒家修身文化的核心理念。一方面，引导农户认识到学习不仅是改善生活的手段，更是修身明理、促进个人与家庭发展的重要途径，从而从思想源头上激发其学习动力，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求知”；另一方面，帮助农户理解农业技术与财务知识的学习应根植于自身实践需求，并开展个性化学习。其二，应强化实践导向，推动知识向能力转化。改变以往“大水漫灌”式的宣教，转而围绕农户在生产经营、家庭预算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开展针对性教学。例如，围绕特定作物的成本核算设计财务课程，或结合养殖周期讲解现金流管理。更重要的是，需建立后续的跟踪辅导机制，引导并帮助农户将所学知识应用于技术改良、成本控制、储蓄计划和借贷决策中，通过“知行合一”的实践循环，切实提升其经营效益与财务稳健性，最终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可衡量的还款能力。

第三，推动儒家修身文化与信贷产品创新深度融合，为“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注入实践动能。

其一，将“实践反思”和“知行合一”的行为模式转化为可观测的信用维度。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可通过数字技术将农户参与职业培训、家庭财务规划等体现“修身”特质的行为，转化为补充信用数据，形成更立体的用户画像，为金融机构服务缺乏抵押物但具备发展潜力的农户提供风控参考。其二，引导金融机构构建“行为—信用”联动机制，开发“修身成长阶梯”利率定价模型。在现有风控体系基础上，可将农户参与农业技能培训的完成情况、家庭财务记录的连续性、现金流管理的稳健程度等可验证行为，设定为信用评估的动态调整参数。对在以上维度表现良好的农户，实施阶梯式利率下浮与授信额度提升的激励政策，使其良好的行为习惯直接转化为融资成本优势，实现“文化资本向金融资本”的价值转化。同时，建立定期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确保这一创新定价模式既能有效激励农户，又符合金融机构可持续经营原则。

综上所述，儒家修身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抑制农户信贷违约，对于“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和当代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深入挖掘与合理运用儒家修身文化这一资源，能够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金融治理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 Guiso L, Sapienza P, Zingales L. Does culture affect economic outcom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 20(2): 23-48.

[2] 江涌. “狼性文化”: 金融本质之文化透视——金融发展与安全思想系列研究[J]. 国有资产管理, 2025(4): 75-80.

[3] 孙光林, 李庆海, 李成友. 欠发达地区农户金融知识对信贷违约的影响——以新疆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 2017(4): 87-101.

[4] 张杰. 儒家伦理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逻辑[J]. 金融评论, 2013, 5(6): 1-38+122.

[5] Wu S, Wan M. Does Confucian culture reduce corporate default risk? Evidence from China[J]. Applied Economics, 2024, 56(34): 4114-4127.

[6] Zhang N, Bo L, Wang X. Confucian culture and corporate default risk: Assessing the governanc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4: 103378.

[7] Zhang N, Bo L, Wang S L, et al. Exploring confucian culture's impact on corporate debt default risk: An ethical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25, 198(2): 467-484.

[8] 古志辉. 全球化情境中的儒家伦理与代理成本[J]. 管理世界, 2015(3): 113-123.

[9] 陈刚, 王燕飞, 何丽. 儒家文化与家庭风险资产投资[J]. 财贸经济, 2022, 43(1): 122-137.

[10] 刘立德. 儒家修身理论与近代修身课本[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6): 71-79.

[11] 曹德本. 中国传统修身文化研究[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5): 17-23.

[12] 杜振吉, 郭鲁兵. 儒家的修身思想及其方法述论[J]. 道德与文明, 2008(1): 53-58.

[13] 苏治, 胡迪. 农户信贷违约都是主动违约吗?——非对称信息状态下的农户信贷违约机理[J]. 管理世界, 2014(9): 77-89.

[14] 丁志国, 覃朝晖, 苏治. 农户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违约形成机理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 35(8): 88-94.

[15] 李庆海, 孙光林, 何婧. 社会网络对贫困地区农户信贷违约风险的影响: 抑制还是激励?[J]. 中国农村观察, 2018(5): 45-66.

[16] 石宝峰, 田锦萱, 孙梦遥. “低学历”抑或“高学历”: 谁带来了更高的违约率[J]. 农业技术经济, 2024(3): 4-19.

[17] 孔荣, Calum G T, 霍学喜. 信任、内疚与农户借贷选择的实证分析——基于甘肃、河南、陕西三省的问卷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11): 50-59.

[18] 孔哲礼, 李兴中. 贷款利率、农户违约风险与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能力[J]. 农业技术经济, 2014(12): 76-83.

[19] 马九杰. 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与信贷约束问题研究[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20] 李聪, 刘喜华, 李慧. 乡村治理能否有效降低农村居民家庭财务违约风险——基于CFPS2018的经验证据[J]. 农业技术经济, 2021 (12): 46-59.

[21] 陆泉志, 张益丰. 农户从测土配方施肥中获益了吗?——兼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缘何“叫好不叫座”[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3(3): 48-

58.

[22] 张社梅, 顾志敏, 邓杰豪. 数字技术何以赋能粮农职业化转型?[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5(5): 1-14.

[23] 李建兴. 乡村变革与乡贤治理的回归[J]. 浙江社会科学, 2015(7): 82-87+158.

[24] 王泉根. 中国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与上虞经验[J]. 中国文化研究, 2011(4): 165-172.

[25] 王璐. 明代儒家省过工夫的发展脉络——以儒家修身日记为中心的考察[J]. 史学月刊, 2020(6): 24-44.

[26] 秦芳, 王文春, 何金财. 金融知识对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 2016(10): 143-158.

[27] Bassen B S. Determinants of successful group loan repayment: An application to Tunisia[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frica, 2008, 10(2): 766-800.

[28] 金智, 徐慧, 马永强. 儒家文化与公司风险承担[J]. 世界经济, 2017, 40(11): 170-192.

[29] 李成龙, 周宏. 资源禀赋、政府培训与农户生态生产行为[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2(5): 22-30.

[30] 聂颖, 赵美顺, 崔钊达. 技术培训如何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5(4): 53-64.

（责任编辑：胡英彬）

Confucian Self-cultivation Culture and Rural Households' Credit Default Risk

WANG Hongjiang, HE Jing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policy guidance of "cultivating a financial sector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n rural households' credit default holds significant practical relevance. Unlike prior research centered on Confucian valu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Confucian self-cultivation culture as a practical framework. Using mixed cross-sectional data from five waves of the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Survey and historical local gazetteers, the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onfucian self-cultivation culture on rural households' credit default through a three-stage simultaneous probi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nfucian self-cultivation culture significantly reduces rural households' credit default.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is effect operates mainly through improved repayment capacity, rather than through enhanced repayment willingnes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paper recommends practical steps such as raising farmers' cultural awareness, implementing "self-cultivation and empowerment" training, and integrating credit products with self-cultivation principles. These measures will help enrich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characteristics financial culture through Confucian self-cultivation culture.

Key words: Confucian self-cultivation culture; rural households; credit default; repayment capacity